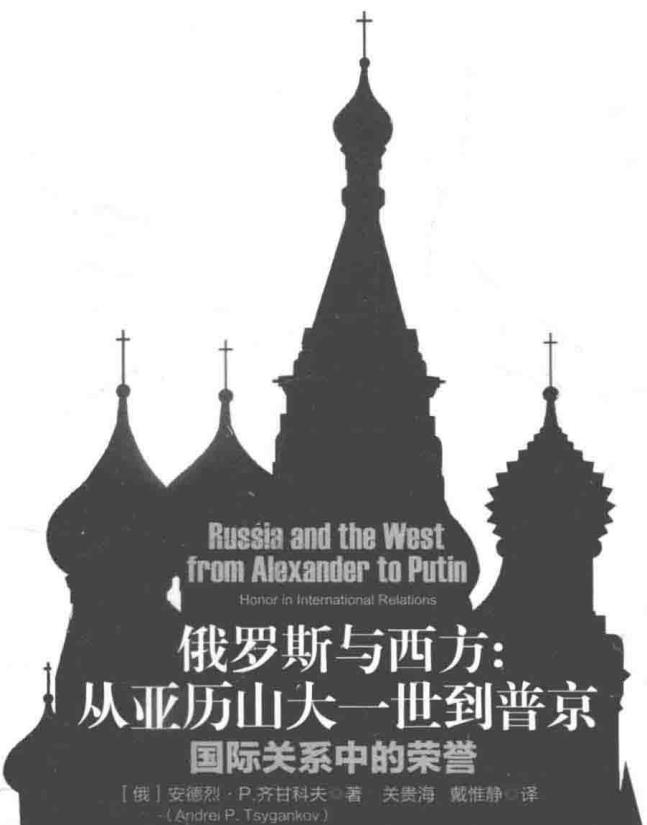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俄罗斯与西方： 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 国际关系中的荣誉

[俄] 安德烈·P.齐甘科夫 著 关贵海 戴惟静 译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俄罗斯与西方：  
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  
国际关系中的荣誉

[俄]安德烈·P.齐甘科夫著 关贵海 戴惟静译  
(Andrei P. Tsygankov)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 / (俄罗斯) 安德烈·P. 齐甘科夫著；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BN 978-7-208-14641-9

I. ①俄… II. ①安… ②关… ③戴… III. ①外交史—俄罗斯 IV. ①D8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0906 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

——国际关系中的荣誉

[俄] 安德烈·P. 齐甘科夫 著

关贵海 戴惟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83,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41-9/D · 3062

定价 65.00 元

## 丛书总序

#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对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 中文版前言

我非常乐意向中国读者介绍自己的新著。因多年在美国的大学讲授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领域同行交流，我一直试图搞清楚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是如何看待它和它的对外政策的。我期盼着这本书能够帮助中国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找到答案，并急切地等待中国书友的回应。

本书写就于 21 世纪的头十年结束之时，因此未涉及整个世界和俄罗斯对外政策在普京重返俄罗斯总统职位后所发生独特变迁。本序的目的在于，采用书中提出的从俄罗斯荣誉观立场出发，扼要分析本书未涵盖的俄罗斯相关政策。这一时期有 2008 年 8 月俄格冲突后的所谓“重启”和新的“冷战”，乌克兰危机为其演进进程的高潮。

## 价值观、荣誉的界定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在理解价值观和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时，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倡若干种方法。现实主义者从利益的重要性出发，认为与维护主权、安全和大国地位相比，价值观是次要的。对现实主义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而应对国家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的安全挑战，是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者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意义是通过价值观来体现的。其中，学术圈子里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国际关系学者们，时常大谈经济全球化、民主化的作用、各国适应全球变化的必要性。与现实主义者相似的是，自由主义者把自己所捍卫的理想看成是某种由国际体系确定了的、无所不包的宝贝。诚然，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要说的不是安全，而是强化民主体制，为跨国商务造

就良好的投资环境。

最后，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首要的是国家历史经验和由它确定的“重要他者”的属性，“重要他者”对一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受制于这种经验，一些国家将首先关心边界安全，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国家却在意政治经济发展。与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建构主义足够多元化，反对关于国家理性片面的、被标榜为“理性”的假设。社会现实在这里不是被看成一成不变的，而是文化价值上独特的存在，价值观则被界定为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的准则。

借重对价值观准则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不适用于考察对外政治利益。不过，它不够充分，需要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提出的安全和发展的范畴等概念工具囊括进来。看来，适当的对外政策理论应当包括的概念有：(1)确定一个民族内在独特性的价值体系；(2)展示一国与国际体系参与者关系的利益体系，一些参与者谋求安全，其他的则在意发展；(3)一国的物质力量综合水平；(4)一国领导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与此同时，关键的是要记住，一国的价值观体系在重要性上是居于第一位的，由它衍生出对外政治行动的准则和方针。在代表民族共同体的人看来，没有比维系和发展他们的价值观体系更重要的东西了。安全和发展的利益是居于第二位的，是在国家与外部环境互动中形成的，那里也有主导者和被主导者。主导者扮演“重要他者”的角色，圈定对外政治行为的语境和指针。如果某个重要他者不承认并且损害一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更不要说它的价值观了），该国的对外政策就会把国际环境视为对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威胁，进而表现出强化民族主义的取向，以及对该重要他者态度上的隔阂。如果该重要他者乐意合作并承认一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该国的对外政策就会是对国际社会开放的，也不会偏好于展示对此重要他者的民族主义态度。

从实现对外政策的手段角度看，物质力量资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国这样的资源很强大并且在增长的话，会更倾向于采取进取性政策；如果资源不够强大且在萎缩的话，则会更少倾向于采取进取性政

策。说到底，在对外政策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作重大决策的国家领导人的个性与认知。在评估现有资源和能力以推行某种更多或更少具有进攻性的政策时，抑或在作出战略性或战术性决定时，领导人的认知可能是较准确或较不准确的。此外，在乎掌权地位的领导人善于利用对外政策实现自己的利益，有时会无视国家基础性的价值观和利益。这种政策不可能是长久的，最终会被纠正，随着民意力量得以发挥，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将起作用。

俄罗斯的价值观体系和国家尊严的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准则：精神上的救世主义、跨族裔性、公正国家，这三个准则在其国家历史中以不同方式被实现着。

俄罗斯人精神上的救世主义显现于莫斯科公国崛起时期，意指文化上独立于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观。在与天主教会首脑的通信里，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打消了罗马将莫斯科公国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企图，在自己的诏书上落款为“携上帝之恩宠的全俄罗斯的伟大统治者”。40年后，文化独立的思想被结晶成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提出者是长老费洛菲依·普斯科夫斯基，他出生在接近教会修道院约瑟夫派的圈子里。处于天主教的西方和穆斯林的东方之间，俄罗斯在与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最终确立了东正教主权。在俄罗斯的全部历史中，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中还是在思想上，一直充分显现着救世者的狂热。

俄罗斯意识中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准则是跨族裔性。俄罗斯人民是由诸如东正教、帝国思想或者共产主义之类的跨族裔的思想统一起来的。虽然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摩擦在帝国里一直存在，但远不像在西方那样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即使是与穆斯林关系中，自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起，也摸索到了相互接受的共存方式。俄罗斯帝国支持了那些向俄皇效忠的穆斯林。

最后，俄罗斯价值观的第三个属性是趋于建立一个强大的、负责任的、可以保障社会产品公平分配的国家。也就是说，国王要保护自己的子民，免遭地主、总督和各种官吏的恣意欺压。这里，俄罗斯式的对公正的界定，加入了经济含义，根植于村社式公平概念，其基础确立于罗

斯受洗时期。

精神上的救世主义、跨族裔性和公正国家，这些价值观聚合在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中：从第三罗马到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东正教、君主制和人民性”以及当今的“主权民主”。还有俄罗斯思想的左翼多样性——从民粹派的村社共产主义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和约瑟夫·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尽管与传统的俄罗斯思想不尽相同，共产主义思想还是蕴含了荣誉中的动机成分，于是，在支持外国共产党时，也不只是出于大国主义的考量。

由荣誉概念统合起来的内在价值与国家安全的外部挑战，一并继续确定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历史上，俄罗斯人遭受了不计其数的外部威胁，也形成了围绕国家的团结局面，并将大国意识纳入了最重要的国家价值观之列。探索大国主义和内在价值观的发展之间的平衡，依旧是国家未来发展中最重要的事。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三种倾向：为应对共同威胁而合作，灵活的结盟政策，进攻性地捍卫价值观和利益。俄罗斯会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大国进行合作，如果它们认同俄罗斯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话。如果这些利益和价值观被忽视，俄罗斯则会走向孤立或具有进攻性。

## “重启”及其破产

“重启”以及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12年3月当选总统，已彰显出俄美关系中分歧的深刻程度。

在两国关系“重启”过程中，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和巴拉克·奥巴马的合作时期，两国在某些方面有所推进，签署了新的限制核武器的框架条约，成立了一系列双边政府委员会以处理具体问题，加深了经济合作（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展能源对话、投资和高技术）。双方得以超越高加索事件和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后形成的几近对抗的氛围。

同时，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中仍有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涉及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华盛顿向东欧国家提供新的武器装

备，美国领导人不肯考虑北约在欧洲安全机制中心地位的替代方案。美国仍然不相信有必要扩大俄罗斯在地区安全机制中的参与度，坚决不肯承认俄罗斯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军事存在。此外，即使在这一时期，白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已使美俄关系陷入困局，坚称俄罗斯的价值观与民主不符。例如，2011年春季访问莫斯科时，美国副总统乔·拜登觉得可以指出普京以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是不适当、不民主的。尽管梅德韦杰夫总统努力塑造“亲西方”的俄罗斯新形象，俄罗斯依旧被怀疑，没被当成战略接近的候选国。美国从俄罗斯那里，就伊朗问题、削减核武器，以及在阿富汗军事行动中提供帮助等方面取得了具体的让步，却不肯形成同莫斯科的战略联盟。

普京2012年3月当选总统，随后，奥巴马同年11月获得连任，标志着两国分歧的加深。虽然在阿富汗问题、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和一系列经济项目上，合作还在继续，但俄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针锋相对：部署反导系统、稳定中东局势、俄罗斯国内的变化和乌克兰危机。莫斯科不仅挑明自己反对华盛顿的立场，并且在行动中直接损害其利益。尽管奥巴马提出邀请，普京在当选总统后，仍然拒绝出席北约芝加哥峰会，以示对美国反导系统立场的不满。克里姆林宫在稳定叙利亚一系列问题上也表现出独立性，拒绝支持西方起草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此外，俄罗斯还拒绝继续参加美国减少核威胁的“纳恩-卢格计划”，之后还不顾奥巴马遣返爱德华·斯诺登的要求，为斯诺登提供政治避难。

在安全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美国又在价值观战线上对俄加大压力，由此惹恼了俄罗斯。美方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案》，堂而皇之地向克里姆林宫展示俄罗斯官僚机构里的贪腐程度，禁止向一部分俄罗斯官员发放签证，冻结了他们的海外资金账户。作为回应，俄杜马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限制美国官员赴俄；还有《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禁止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

如何解释“重启”的失败和普京再选总统以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向？前述分歧的基础是美方不承认俄罗斯的价值观和利益，以及普京

奉行进取性对外政策的打算。如今，克里姆林宫拉开架势，要把“可控民主”思想、跨族群的国家文明和社会保护主义列入俄罗斯价值观。尽管俄罗斯价值观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也还处在形成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压力和不肯承认俄罗斯有权自主发展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使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取向走强。普京执政的最初阶段，俄罗斯力求把自己放到西方世界一分子的位置上——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并具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利益。即使在欧亚地区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后，克里姆林宫仍保持了这种姿态，尽管在国内采取了措施以限制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活动。在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坚持发展与西方关系的立场不仅保持下来甚至得到强化，美国当局对俄罗斯新任总统的友善态度，包括很少批评俄罗斯，<sup>1</sup>也促进了俄罗斯的亲西方立场。

然而，普京重新当选后，将侧重点放在建构可以统合俄罗斯族和非俄罗斯族人、巩固强国架构和提升传统价值观的新思想上。2012年初，普京在自己的一篇竞选文章中提出了国家文明的概念，呼吁把俄罗斯族当成俄罗斯文化和国家的蓝本。<sup>2</sup>同时，他反对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企图，认为这有悖于本国千年历史，是摧毁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最短路径”。<sup>3</sup>普京表态的另一个主题是巩固国家，以打击腐败、扫除激发国内种族暴力的护法体制问题。最后，普京特别关注“精神价值缺失”问题，提议巩固负责精神价值发展的机制，包括学校和家庭。普京还批评欧洲偏离了传统的宗教和家庭价值观，并宣称，“力求在精神、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领域保持独立和主权”，是“我们民族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4</sup>。在2013年致联邦议会的咨文中，普京把自己对俄罗斯的理解表述为“保守主义”强国和全球范围内的传统价值观捍卫者。<sup>5</sup>

轮廓清晰的意识形态转向在国内得到了支持，也推动了民族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自主的文明发展的构想和理论，得到官员、以基里尔大牧首为首的东正教上层和包括俄共、统一俄罗斯党在内的政治精英的支持。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和俱乐部，力图强化国家远离西方政治家兜售的价值观的意向。在俄罗斯，对抗议运动的态度变得更强硬了，

特别是对那些试图贬损国家文明价值观、强大国家和传统价值观新提案的人。其中，以流氓罪和藐视东正教廷罪判处了“暴动小猫”(Pussy Riot)组合。此外，还通过了处罚“在儿童中间宣传非传统性关系”行为的法律。<sup>6</sup>

与价值观性质分歧相伴的，还有俄罗斯不接受美国主导全球的企图、无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文件宣称，多极世界已形成，其间，与美国的合作被看成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因对全球威胁有共同认识而联合在一起。北约东扩、在紧邻俄罗斯边界的地方部署反导部件、西方国家不愿认真考虑安全合作的可能性，都使克里姆林宫里主张强硬路线和采用武力资源巩固国家的人的地位得到强化。欧亚地区发生“颜色革命”、中东地区发生动荡以后，人们确信，美国是在俄罗斯的抗议群体身上下注，并力图篡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体制。

## 乌克兰危机

2014年2月发生政权变更革命的乌克兰局势成为俄美矛盾的一个高潮。美国和欧盟承认了基辅的新政府，而俄罗斯领导人则将其定性为“违宪政变”。直至2014年5月乌克兰总统选举，俄罗斯仍拒绝与基辅的新政府接触。同时，莫斯科向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提供了庇护，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在俄乌边界集结了大规模的军队，催生了乌克兰东部对抗情绪的升级。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普京把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称为“纳粹分子、民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主义势力的恣意妄为”<sup>7</sup>。

在政权被冲垮和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之后，乌克兰的武装冲突依旧在扩大。无论是反叛军还是乌克兰的极端分子，都未打算遵守2014年4月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解散武装的要求。5月2日，40人在敖德萨被活活烧死。春夏之际，在乌东部的武装冲突具有了最残酷的形式，双方都使用了重型武器，难民和无辜受害者的东部居民数量急剧增加。虽然乌克兰政府军看上去占上风，但8月下旬，反叛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转向反攻，形成了对敌方主要力量的合围，并恢复了对顿涅斯克以南

区域的控制。这些战果支撑了9月份在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这些协议未能为持久和平打下基础。乌克兰东部的战事在继续，2014年12月最终还是签署了新的和平协议。这些协议是否奏效或是战火再燃，仍不明朗。

作为对俄罗斯领导层所作所为的回应，美国主使下的西方国家政府对俄罗斯部分官员实施了制裁，并威胁通过银行业和分部门的制裁，在经济上进一步孤立俄罗斯。西方把乌克兰危机的全部责任扣在俄罗斯头上，却把自己和基辅当局撇得一干二净。西方给予了基辅当局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持，却用最后通牒和制裁的口吻对莫斯科发号施令。2014年7月，马来西亚客机飞越乌克兰领空时被击落，机上289人丧生。在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和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罪责依然是加在亲俄的乌东地区反叛军和俄罗斯身上。西方针对俄罗斯经济采取了补充制裁措施，欧盟这次也积极参与到制裁中来。其中，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能源设备被禁止(对俄)出口，限制俄罗斯资本进入欧洲市场。<sup>8</sup>作为回应，俄罗斯启动了己方的制裁，限制欧盟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总体上讲，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降至相当低的水平。在西方国家，反俄情绪和势力在强化。许多美国政治家如今从俄罗斯身上看到了重大威胁。对政治阶层情绪敏感的奥巴马也是这样谈论(俄罗斯)的。无论俄乌关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基辅都被看成是受害者，莫斯科则是侵略者。西方主要媒体，对有关乌克兰当局与敖德萨惨案、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大规模轰炸平民、使用白磷弹、马来西亚客机空难、赞美和鼓动纳粹主义等有关的诸多行径中的罪责问题，却装聋作哑。俄罗斯变成了“负面他者”，通过与它对比，有人在竭力证明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的至高无上地位。

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政治阶层的争论转向了仅仅是探讨两种可行的、也不相互排斥的选项：要么借助北约遏制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对外政策野心，要么在所有问题上孤立俄罗斯，包括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它宣战，直至普京下台继而推翻“普京体制”。主张第一种方案的政治家包括曾任克林顿总统顾问、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

特(Strobe Talbott),他曾宣称回归遏制政策是“西方战略和北约使命”的最佳选项。<sup>9</sup>在广泛的问题层面上与俄罗斯对抗的政策,是从莫斯科归国的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提出的。他对奥巴马政权不够强硬的政策深感失望,准备重新扮演对“普京专制”的不妥协的斗士角色。他在驻俄大使任上未能成功联合普京的反对派,在俄罗斯政治圈里名声扫地,如今集中精力为在思想政治上对抗克里姆林宫打好基础。他在2014年3月《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指出,俄西关系的变动期终结了,正如对俄领导人愿意“逐渐融入现存国际秩序”的预期不复存在一样。俄罗斯新政权就是要对外扩张、对内打压反对派的专制体制,因而,在拓展的问题空间里与它全面对抗,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当然之选。<sup>10</sup>

局势让人想起的不只是双边关系危机,还有(西方)在经济和价值观上对俄罗斯宣战,旨在惩罚俄罗斯领导人的固执,实施对乌克兰局势演变的全面控制。

解释俄罗斯的立场,要结合其领导层捍卫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不被西方践踏的坚定决心。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是俄罗斯的利益,为了保住它,俄罗斯“合并”了克里米亚。克里姆林宫确信,乌克兰政权更替意味着这个国家回归到亚努科维奇的前任维克多·尤先科的表态和政策上,即把乌克兰拖入北约,不顾俄罗斯和相当多乌克兰人的反对。加入欧盟但不入北约的说法,也没能说服克里姆林宫里的多数人,他们认为(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是进入北约的一条新通道而已。

在俄罗斯看来,其价值观在乌克兰遭受冲击是实质性问题。那些在尤先科时期受他支持而力图瓦解俄语地位、侵蚀与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有关的历史认知的人,基辅政权更替后他们的地位被强化了。新政府废除了保障俄语地位的法律,延续了摧毁俄乌共同历史记忆的路线。新政府中不乏那些在政治上与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党”一个鼻孔出气的人,该党的思想先驱们曾站在纳粹德国一方反抗苏联,并参与了对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大屠杀。<sup>11</sup>

##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未来

俄罗斯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进一步形成，与其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的国际行为要仰仗的价值观基础、物质力量资源和理论支撑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必须了解和发展本国领导人倡导的俄罗斯价值观，涉及保持族群多样性、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维护传统的教育和家庭价值观。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中推广价值观有不少历史潜力。可是，这些价值观应该首先被清楚地表述，被广泛的社会阶层认同。为此，必须与集团利益和高层权力腐败做斗争，提出长期发展的任务。必须打造出契合时代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和国家思想，这是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可以胜任的事，但不是演说家、专家和媒体记者干得来的活。

有了对价值观的内在认知和发展，就可以将其推广确定为对外政策的任务，积极行动起来，与欧盟、美国、土耳其等其他国家在价值观层次上展开竞争。这些国家如今在欧亚和其他地区积极推广自己的价值原则。从某些观点看来，用一种价值观导向体系对抗另一体系是站不住脚的：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而言，西方主义可以与世界体系的其他部分融合甚至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俄罗斯拉近了西方和东方，却依然是自己。若不积极实施在世界上保存、捍卫和推广自身价值观的政策，俄罗斯文化影响的空间将会继续被挤压，类似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欧亚危机将会变成常态。

第二，其他资源、包括价值观资源不足，决定了发展物质力量资源的重要性，这一点相当重要。意识到国家在对外政策中采用物质力量资源的边界并着力推动价值观体系建设，也是有实质意义的。实力不足却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计划带来的精疲力竭，是俄罗斯政治家应该好好汲取的教训。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不应当成为苏联政策的翻版，也不应当效仿引发 1914 年对德奥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如今美国在世界上推广自由民主计划的费力不讨好也是应该汲取的教训。目前的阶段，或许是相对较长的时期里，不是恢复“我的帝国”之日，而是在那些有基础的地方凝聚、珍存和小心翼翼地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之时。

俄罗斯需要准备长期和执着地在世界上确认自己的位置；并且，指望西方文明的危机和衰退，一是未必会应验，二是原则上是否有好结果尚值得怀疑。

最后，必须探索俄罗斯对外政策新的理论支撑。要重新思考当代国际关系的特性、与盟友和竞争者互动的方式、外部威胁的性质和应对的最佳方案。形成真正多中心或多极的世界，非一日之功。世界的不确定或不均衡时期恐怕会延续不止一个十年，且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俄罗斯对外政策需要有新的指针。

## 注释

1. В США стремились укреп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Медведевым, надеясь усилить его позиции и ослабить Путина(Paul J.Saunders, “Another Setback for the Reset,”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6, 2012, <http://nationalinterest.org>).
2. Путин В.В.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это полигэтниче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крепленная русским культурным ядр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 января 2012.
3. Путин.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ов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до 2025 года была подписана Путиным в декабре 2012 года и вновь определила Россию в качестве « уникального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го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При это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лоббирования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ылка на этнический русский стержень была опущена (Коммерсант, 19 декабря, 2012).
4. Путин В.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president.kremlin.ru>.
5. Путин В.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3 декабря, 2013, <http://president.kremlin.ru>.
6. “Moscow Dismisses Western Criticism of Gay Propaganda Law,” *RIA Novosti*, August 7, 2013.
7.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В. Путина, Kremlin.ru, 4 марта 2014 <http://eng.kremlin.ru/news/6763>.
8. Alexey Eremenko, “Who Is Benefiting From West-Russia Sanctions War?,” *Moscow Times*, August 6, 2014.
9. Peter Baker, “Obama Team Debates How to Punish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4.

10. Michael McFaul, “Confronting Putin’s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14.

11. Подробнее о мотив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м: Andrei P.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Last Stand: The Source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Post-Soviet Affairs*.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060586X.2015.1005903>.